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叠加区域乡村振兴的多维困囿、现实契机与行动路径*

吕进鹏^{1,2} 贾晋³

摘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叠加区域见证了中国各族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着全国各族人民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牢固根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叠加区域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是民族成分多元的革命老区，而且有别于一般少数民族聚居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叠加区域乡村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民族特质显著、发展依赖政策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叠加区域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要充分考虑到区域因素与民族因素有机结合，进一步发掘丰厚的红色资源和革命元素。具体到实践，亟待在审视均衡性治理与国家化整合、政策衔接与战略规划的基础上，深入探析历史牵绊与现实挑战，把握政策联动、社会巨变、生态治理、文化集成的“后发”优势。“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叠加区域乡村振兴行动的开展，需要加快产业融合振兴，积极培育“红色产业+民族特色产业”；就地盘活党史中的民族团结教育资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心聚力；发挥红色文化与生态文化浸润功能，防止返贫文化惯性并防范民俗异化；有效推进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扭转民主治理的“少—边—穷”困局。

关键词：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302.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20年中国历史性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①。在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指出：“脱贫攻坚战的全面

*本文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防止凉山彝族自治州返贫的实证研究”（编号：21FGLB090）、四川省社科规划脱贫攻坚暨乡村振兴重大项目“凉山彝族自治州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实证研究”（编号：SC21ZDXTX008）和成都市哲学社科规划项目“成渝地区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与经验研究”（编号：2022CS001）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

^①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23：《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第13页。

胜利，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同时，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②。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不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③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既要全国一盘棋、又要考虑区域特殊性。

基于“中国乡村差异显著，多样性分化的趋势仍将延续”^④这一现实状况，学者们从多个层面对特殊区域乡村振兴展开研究。一是重点审视欠发达区域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困境。例如：西部区域的历史底色、现代化起点与中东部地区差别较大，且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突出（徐勇，2019）；中西部地区将有限的资源重点用在了脱离地方实际的乡村振兴上，没有做好基础性乡村建设工作（贺雪峰，2020）；偏远山区、民族地区、生态脆弱区等多类型重叠地区仍然面临“插花式”贫困与整体性贫困问题交织、地区建设任务与脱贫攻坚任务重叠、发展能力不足、脱贫攻坚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存在政策的精准性与整体性矛盾等问题（高杰，2020）。二是认识到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的机遇。例如：在中国反贫困努力之下，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8年的1.7%，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缓解（汪三贵和胡骏，2020）；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农业增长的区域分化程度将进一步扩大，云南、贵州、甘肃等欠发达区域属于高成长型农业区（叶兴庆，2021）；革命老区振兴规划是基于财政资源投入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区域发展政策，因而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代表的落后地区更有可能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取得农业的额外增长（张启正等，2022）。三是探讨了特殊条件制约下的乡村振兴路径。例如：乡村振兴要深入考虑所在乡村的隐含假设条件，包括时间、空间和背景条件（秦中春，2020）；要建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一致性与路径多元性相结合、国家整体制度安排与地方因地制宜探索相结合、基础性制度体系与差异性政策体系相结合的集成化政策方案（陈文胜和李珊珊，2022）；应更加注重提升区域发展能力，更着眼于区域经济协作，将帮扶转化为互惠互利的合作（林万龙和纪晓凯，2022）。

既有研究基于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的区域性困境和特殊路径，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类型化推进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模式。但总体上而言，对于涵有自然、红色、历史、民族、宗教、生态等特征的多重类型叠加区域乡村振兴的探讨尚显阙如。“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叠加区域（下文简称“叠加区域”）具有特殊性，它不仅是民族成分多元的革命老区，而且有别于一般少数民族聚居区。该区域乡村振兴

^①习近平，2021：《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月26日02版。

^②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1-32页。

^③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http://www.lswz.gov.cn/html/xinwen/2023-02/13/content_273655.shtml。

^④参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实施，需要充分考虑多重因素叠加的特征。其一，就地理空间范围而言，叠加区域乡村均处于地理位置偏远、地缘环境封闭、交通条件落后的西部省份（主要包括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宁夏等），同时是不同省份毗邻地区。其二，就经济发展程度而言，历史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生产呈现一种非集约式的耕猎或耕牧结合的特点，自然经济的低水平循环，使得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始终与历史保持着黏合性。加之自然生态脆弱、农牧民受教育水平低下，人力资本和现代技术缺乏，该区域的经济的发展更为落后，贫困在这一区域发生代际传递。其三，就社会民族特质而言，“革命老区+民族地区”乡村民族成分多元、宗教信仰迥异，形成于特定历史场景中的民族认同根深蒂固、思想观念更为保守，常被冠以“老、少、边、贫”之名。与此同时，该区域乡村是中国共产党早先团结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和践行党的民族政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关键场域。其四，就国家政策扶持而言，“革命老区+民族地区”乡村拥有各族人民认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奋进的历史根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该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均严重依赖国家政策支持、更容易得到国家政策关照。在全面小康路上，党中央始终坚持通过政策扶持，“不让一个人掉队，不让一个区域落下，不让一个民族落后”^①。

鉴于此，叠加区域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需要综合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国家政治整合、民族宗教问题等进行分析。本文在明晰叠加区域乡村振兴高质量推进的重大意义的基础上，深刻认识现实困囿、把握有利契机，进而探赜理性路径，以期“统筹推进革命老区振兴，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多措并举解决高海拔地区群众生产生活困难”“建立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互助、区际利益补偿等机制，更好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共同发展”^②等目标愿景的实现提供理论参照与现实参循。

二、叠加区域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是中国这一超大规模国家步入现代化中后期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旨在消除区域、城乡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性规制与结构性矛盾，实现核心与边缘地带、发达与欠发达区域均衡发展，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全方位、全过程、全领域整合与振兴乡村社会的系统性工程。

（一）超大规模国家的结构性失衡与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多维度均衡

均衡是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理想状态，然而，现实的发展往往是在不均衡规制下进行的。特别是在一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剧烈性转型和跨越式成长的过程中，区域和城乡之间的不均衡状态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显现，这是大国治理中的结构性失衡特点。中国创造了世界上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文明的优势逐步丧失。囿于地理环境、交通条件、信息技术、人口素质、经济水平等的差异和前现代社会国家能力的不足，乡村与城市长期在一种非均衡状态下演进。正如马克思所言：“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

^①资料来源：《中国的全面小康》，http://www.gov.cn/xinwen/2021-09/28/content_5639786.htm。

^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7-99页。

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①与传统农业社会不同，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讲求经济发展要素的快速流动，其结果是工业资源、经济资本等不断集聚于投资成本较低、自然条件优越的城市，而交易成本较高、缺乏区位优势乡村成为边缘和欠发达区域。在现代化加速推进的当下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②。现代化衍生的城乡差距遭遇国土空间的差别、不同民族的差异相互叠加的困境，尤其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同时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欠发达地区。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曾遇到的，叠加区域乡村成为边缘区域的边缘。上述独特的政治地理空间特性和人文历史底色使得叠加区域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显著特殊性。步入现代化中后期的中国社会，为了破解区域城乡差异、传承红色精神、促进民族融合，需要依靠强有力的政党和强大的国家能力，分步、分类推进乡村振兴工程，实现城乡、区域、民族等多个维度的融合均衡发展，以化解超大规模国家的结构性失衡困境。

（二）重点区域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客观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叠加区域乡村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农牧民人口基本达到小康生活水平。以“三区三州”重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为例，贫困人口由2018年的172万减少到2019年的43万，贫困发生率由8.2%下降到2%^③。当前，中国正处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融合交汇、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政策过渡阶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④。叠加区域是深度贫困地区，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场域，也是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推进的重点区域。在自然空间和历史条件制约下，叠加区域的相对贫困治理同样具有特殊性：一方面，就贫困内涵而言，叠加区域本身面临摆脱绝对贫困之后的相对贫困问题；另一方面，就区域相对性而言，以发达区域为参照，叠加区域是相对贫困地区。

解决叠加区域相对贫困问题，不仅要关注经济收入方面的低洼，更要关注当地农牧民在社会权利、政治行为、角色期待、文化认同等方面存在的相对贫困。为此，从阶段性的现实政策衔接层面考虑，叠加区域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有利于积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阻断规模性返贫发生；另一方面，将多层次、全方位加快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建设，建构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三）革命老区振兴进程中着力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⑤，对于超大规模国家而言，共同富裕是国土空

^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56页。

^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页。

^③资料来源：《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https://www.gov.cn/xinwen/2020-01/05/content_5466558.htm。

^④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8页。

^⑤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2页。

间的各个部分、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经济财富与政治权利等全领域的共同富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下文简称《纲要》）明确指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①从《纲要》的表述不难发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前提条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分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方式，共同富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导向与远景目标。乡村振兴承载着“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②的重大使命。只是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需要结合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现实分步动态推进，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们要实现 14 亿人共同富裕，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齐头并进。这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要持续推动，不断取得成效。”^③叠加区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后起区域，要迈进 2035 年的共同富裕生活，该区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重点是激发乡村人口的致富潜能。进入新发展阶段，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宁夏等叠加区域（见表 1）通过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特定区域范围内城乡一体、民族融合、社会均衡发展，这是有效防止区域之间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最终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前提。叠加区域乡村具有特殊性，这类乡村的振兴面临自然地理阻隔和历史底色牵绊的困境，承载着激发内生发展动力、强化国家政治整合、防止贫困文化惯性、实现民主治理的使命。

表 1 叠加区域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

革命老区	省份	重点市、州、县
川陕革命老区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冕宁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
滇桂黔边区（广西左右江革命老区）	云南省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广南县
	广西壮族自治区	百色市德保县、靖西市、那坡县、凌云县、乐业县、田林县、隆林各族自治县；河池市凤山县、东兰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巴马瑶族自治县、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崇左市天等县；南宁市马山县
	贵州省	遵义市正安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松桃苗族自治县；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望谟县、册亨县；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三都水族自治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从江县
陕甘宁边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吴忠市红寺堡区、同心县；固原市原州区、西吉县；中卫市海原县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十四五”支持革命老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实施方案〉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2/01/content_5655189.htm。本文依据该通知，选取叠加区域集中分布的西部省份（涵盖 16 个市、州）为研究对象。

^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0 页。

^②资料来源：《扎实推动共同富裕》，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10/15/c_1127959365.htm。

三、叠加区域乡村振兴的多维困囿

（一）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低下与内生性发展动力不足

在现代化进程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叠加区域乡村转型高度依赖国家政策和外部力量，依靠自身区域生态、文化民俗、特色产业等优势资源的内生性发展动力不足。且叠加区域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区，均为深山、石山区和生态脆弱区，灾害频发，生态保护与灾害治理任务艰巨（例如，近年来川陕革命老区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境内地震频发，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草场沙化、土地荒漠化等问题严重^①）。国家资源的大量投入难以迅速转变为当地发展的内生动力，大规模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促进社会流动性的要素在这一区域难以满足，人口经济收入底子薄（见表2）。

表2 叠加区域与全国、西部五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比较

地区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公共预算支出/公共预算收入	城市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全国平均			80976	1.21	47412	18931
西部五省份平均			46753	2.85	39676	15266
川陕革命老区	四川省	冕宁县	34794	3.27	31770	17533
		会理市	51163	2.99	34994	20658
		红原县	41854	19.82	37483	15919
		泸定县	38524	4.63	31917	14761
滇桂黔边区(广西左右江革命老区)	云南省	马关县	40571	4.78	36936	13271
		广南县	22899	10.16	33184	12636
	广西壮族自治区	德保县	38804	4.39	38132	13773
		靖西市	32486	3.79	34224	13777
		那坡县	27612	10.56	29122	11098
		凌云县	29254	11.55	32980	11757
		乐业县	26069	8.99	34854	12162
		田林县	34415	7.89	34435	14921
		隆林县	20897	11.59	35902	12066
		凤山县	19682	12.80	28394	10757
		东兰县	23059	16.56	28804	10768
		罗城县	24027	11.25	28053	10846
		环江县	26216	7.75	32817	13197
		巴马县	39286	4.76	31721	11054
都安县	14801	12.02	28783	10945		

^①资料来源：《四川现有荒漠化土地3000万亩 防治“地球之癌”》，http://sc.cnr.cn/scpd/yw201/20210623/t20210623_525519244.shtml。

表2 (续)

滇桂黔边区(广西左右江革命老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大化县	21272	9.32	28667	11090
		天等县	31104	12.56	32618	13767
		马山县	24676	18.41	32177	14213
	贵州省	正安县	34651	10.58	36747	13588
		务川县	29615	7.44	36796	13479
		沿河县	33642	16.02	34971	11683
		松桃县	38627	10.11	35431	11788
		晴隆县	40974	5.33	36254	11121
		望谟县	47905	8.68	36250	10824
		册亨县	46447	5.68	36510	11076
		罗甸县	36807	6.39	35911	13924
		三都县	34596	9.93	35874	13530
		榕江县	30338	10.46	36232	11753
		从江县	25794	11.65	37474	12316
		陕甘宁边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红寺堡区	43111	15.84
同心县	37648			16.20	29037	12656
原州区	33554			28.82	34683	13712
西吉县	25453			37.65	31241	12772
海原县	26558			25.97	29478	1174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云南省统计年鉴2022》《四川省统计年鉴2022》《贵州省统计年鉴2022》《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年鉴2022》《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计年鉴2022》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由表2可知,西部五省份、叠加区域各县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平均水平与全国人均生产总值平均水平的差距均较大,且叠加区域各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低于西部五省份平均水平。在公共预算支出与公共预算收入之比方面,五省份与叠加区域各县均远大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地方政府支出远超过收入,财政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差,财政外部依赖性较大。在城市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除个别县外,绝大多数县的平均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加之叠加区域乡村地缘环境封闭,交通条件落后、运输距离较长,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需流通成本高,导致商品价格高昂,降低了产品竞争力,从而限制了经济活动的开展。同时,地理位置偏远附带的人口密度小、消费能力有限和市场需求不足导致市场规模较小,进而挤压了企业拓展市场的空间,造成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乡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基本落后于西部五省份和全国平均水平。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起点造成的观念滞后和现代教育体系缺失,又进一步限制了叠加区域人才队伍成长以及科技水平发展。劳动力素质低,人才流失严重,资源和技术优势缺乏,不便于获取现代技术,极大限制了该地区创新和发展潜力,进一步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总之,叠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产业结构单一造成区位发展劣势,同时经济的低水平发展也造成教育、文化、观念的落后,使得叠加区域的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公共预算收支和城乡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制约了当地发展。上述短板成为叠加区域乡村振兴特殊性的重要方面，这种特殊性致使该区域成为中国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地区。

（二）区域社会的张力与艰巨的国家整合使命

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通过一体化制度方略，不断建构与整合欠发达乡村。然而，区域、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巨大反差，致使追求统一性的现代国家建构理性与叠加区域特性之间出现更大的张力，对现代国家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相对于传统国家治理，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特征在于它将少数民族（详见表3）和偏远乡村社会纳入政治统一体并采取实质性治理。

表3 叠加区域少数民族分布概况

革命老区	省份	重点市、州	少数民族构成	少数民族人口比例(%)
川陕革命老区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	彝族、藏族、回族、傣族等	57.9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藏族、羌族、回族等	81.8
		甘孜藏族自治州	藏族、彝族、羌族、回族等	81.9
滇桂黔边区 (广西左右江革命老区)	云南省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壮族、苗族、傣族、白族等	57.5
	广西 壮族 自治区	百色市	壮族、瑶族、毛南族等	83.5
		河池市	壮族、瑶族、侗族、仫佬族等	85.3
		崇左市	壮族、瑶族、苗族、侗族等	89.6
		南宁市	壮族、瑶族、仫佬族等	51.5
	贵州省	遵义市	仫佬族、苗族、畲族、土族等	12.6
		铜仁市	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等	70.5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布依族、苗族、黎族、瑶族等	42.5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布依族、苗族、侗族等	59.8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苗族、侗族、瑶族、水族等	81.8
陕甘宁边区	宁夏	吴忠市	回族、东乡族、撒拉族等	54.7
	回族	固原市	回族、东乡族等	48.8
	自治区	中卫市	回族、藏族、东乡族等	36.8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叠加区域市、州政府门户网站等公开发布的少数民族人口状况信息整理所得。

现代国家建构是一种国家整合行为，具有明确的建构主体与客体，“其主体是具有合法性地位和政治权威的政党或政府，其客体是导致国家社会裂变、削弱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国民同质性的宗教信仰、种族、不同标准的社会分层等体制疏远因素和力量”（严庆，2012）。对于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国家建构可谓任重道远，需要克服区域、城乡、民族差别带来的张力。“作为历史发展的大势，经由‘部族国家’而向着‘公民国家’进行过渡是一切国家迟早都要完成的转变。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内部不同区域在转变的形式与速度上出现不同步、不平衡的现象。”（于春洋，2016）与此同时，现代国家的治理能力、自主性扩展，在不同的区域产生差异性结果，也就是说，“国家影响力在领土范围内是不均衡的，在某些区域比其他区域展现出更强的控制力和执行力，那些由中央向外辐射的制

度或政策在不同的区域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中心—边缘’的地域差异带来控制权威的显著性变化。”（马天航和熊觉，2018）。叠加区域乡村是现代国家政治整合尤为艰难的地区。可以说，叠加区域乡村兴衰是检视中国这样超大规模国家建构成效的“晴雨表”：乡村兴盛，则国家内的同一民族、不同民族“互融共生”（罗敏等，2016）发展；乡村衰败，则同一民族因阶层分化产生分异。如何协调城乡关系、缩小区域差距、革新边疆民族地区传统自治组织、发展基层民主、健全治理体系、改善民生问题、建构合法性认同，成为叠加区域乡村振兴面临的重大挑战。

（三）防止贫困文化惯性与化解规模性返贫风险

高质量推进欠发达区域乡村振兴，是消退贫困底色牵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构建规模性返贫阻断机制的必要条件。“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①当人缺乏生产和再生产的积极性时，贫困就成了特定的思维和行为结果。在叠加区域，贫困延续和规模性返贫的发生往往与贫困文化惯性息息相关。在学者们看来，“贫困文化”是一种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是一套穷人共享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体系，具有代际传递性，一旦形成，便会代代相传，甚至演变为“反文化”（张雪和叶忠，2018）。例如，藏族地区的宗教文化会对农牧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不同层面的影响。“第一，经济行为的谋生性而非谋利性。生产与经济行为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存即生命运动的最低消费。若去谋利，便是人格上的污点，将最低消费水平之外的财富全部奉献给寺庙。第二，经济行为的消费性而非创造性。人们用极其有限的物质消费‘满足’其最基本的生命运动，在清心寡欲、精勤不息的修行中度过一生。”（次旺俊美，2008）川陕革命老区的甘孜州和阿坝州农牧民同样深受这种贫困文化的影响。民主改革后不久，农牧民“又跌跌撞撞、稀里糊涂地迈进了人民公社，这种急剧的变革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很难适应，现实情况是，他们每前进一步，都受到传统和文化的沉重拖曳和重重阻碍”（李成武，2005）。在消除绝对贫困的时代背景下，叠加区域的贫困文化底色前所未有地淡化，但是受到文化惯性影响，叠加区域依然面临规模性返贫可能发生的挑战。

（四）复合型治权结构的历史牵绊与现代民主治理能力的贫乏

历史上，在地理阻隔、交通障碍、信息不畅、制度底色等因素的影响下，叠加区域的乡村成为边疆的“边缘”，中央权威无法直接有效治理广袤的边疆乡村社会。例如民主改革前，川陕革命老区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滇黔桂边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村寨中生活的少数民族寨民（彝族、布依族、苗族、侗族等），以及川陕革命老区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游牧为生的牧民们往往缺乏主体地位，深受传统自治共同体及其代表的复合型权力的支配^②（吕进鹏和裴元圆，2020）。马克思对于此类社会形态有过概括：“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

^①恩格斯，1998：《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页。

^②即整体性权力（整体性的空间范围、共同体所有的产权制度、丰富多样的治理组织、整体的文化伦理等塑造的整体性权力）和个体性权力（首领、头人等）的双重支配。

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①这种个体对整体的依附性成为叠加区域乡村迈向现代社会的底色。民主改革以来，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然而，一跃跨千年的制度变迁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上治权结构的影响，当地缺乏农牧民自主治理的社会土壤。为此，叠加区域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不得不整合不同的权力资源，保障农牧民主体地位、实现农牧民自主治理。叠加区域乡村振兴任重道远，面临上述重重挑战。然而，在强大政党引领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断克服地理阻隔、城乡割裂、区域差距等导致的结构性失衡困难，重点帮扶叠加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正是在政策倾斜、社会巨变、生态治理、文化振兴的现实条件下，叠加区域乡村振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四、叠加区域乡村振兴的有利契机

（一）政策联动契机：单一制国家制度优势向政策效能的深度转化

进入新发展阶段，党中央高度重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等欠发达区域的乡村振兴，动员全党全社会力量，通过区域协作、结对帮扶、经验互鉴的联动性政策机制，将单一制国家结构和制度优势深度转化为政策效能。

1.区域协作机制与适应性的政策。国家结构的特点影响其治理功能的发挥，中国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单一制国家的最大特点在于能够从国家整体出发协调不同区域，出台适应不同区域的特殊政策，以期实现均衡发展的目标。叠加区域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着单一制国家的制度基础，即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推行适应国家结构的区域协作政策。中央协调统一和行政动员，高位推进东部与西部协作、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协作，实现资金供给、产业转移、技术支持、人员流通等。正是多年来“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区域互助机制、区际利益补偿机制”^②，累积了富有弹性的政策，使叠加区域乡村振兴有了更强大的外部动力。

2.结对帮扶机制与包容性的政策。近年来，在振兴革命老区、巩固革命老区脱贫攻坚成果的背景下，国家进一步创新结对帮扶的包容性发展政策。在国家整体层面，《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对口合作工作期限为2022—2030年）指出，经济特区深圳市结对帮扶百色市（左右江革命老区），珠海市结对帮扶遵义市（滇桂黔边区）^③；在各省份内部，由发达地区支援和带动欠发达地区，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等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对帮扶欠发达地区乡村及贫困农户，前者为后者提供资金支持、产业思路、就业渠道、技术指导、教育培训、治理策略等，党员干部

^①马克思，20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8-21页。

^②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g/201901/20190102828923.shtml>。

^③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6/08/content_5694557.htm。

更是发挥先锋带头作用，一对一帮扶乡村居民。在美国和印度这样的联邦制国家，州与州之间、邦与邦之间的帮扶难以实现，只有单一制的中国才能实现这种包容性发展，这为叠加区域乡村振兴提供了政策基础。

3.经验借鉴机制与互通性的政策。不同类型区域推进乡村振兴虽有特色和差异，但是也有共性和规律。发达区域乡村在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方面先试先行，有着显著优势，积累了更加丰富和较为成熟的经验。在区域协作、结对帮扶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均积极倡导和实施经验互通、信息共享的政策，叠加区域不间断安排考察组前往发达区域乡村现场感受、考察学习，创造性地借鉴和吸收发达区域的经验，营造“学习型社会”氛围。例如，滇桂黔边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于2021年10月以“远学浙江、近学红河、身边学典型”为工作要求，积极开展“学习经验找差距、拓宽眼界抓落实”的活动，外出考察以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等做法^①。这种学习和复制成功经验的方式，有助于叠加区域乡村振兴的决策者和实践者深刻检视差距、审视差别，从而减少乡村转型阵痛、避免陷入误区、加快振兴步伐。

（二）社会巨变契机：新发展阶段迎来叠加区域的“后发”崛起

新时代，党中央前所未有地反贫困，实行精准扶贫策略、创新扶贫机制，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整体性贫困问题得以解决，“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地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1.区域性整体贫困的基本消除提供先决条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战役和战略的关系”（卢黎歌和武星星，2020），消除绝对贫困，为乡村振兴创造了条件。截至2020年底，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不复存在，民族地区与全国贫困发生率的差距显著下降（王延中和丁赛，2020）；截至2020年底，广西左右江革命老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30.32万人全部脱贫，2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23.72%下降到2020年的零^②；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陕甘宁边区）更是创造、总结出“驻村帮扶”“能人引领”“休闲旅游”等“十大脱贫模式”，西吉县建档立卡人口从2014年的15.6万人减少到2019年的4340人，贫困发生率从34.4%下降到0.95%^③。整体脱贫的系列性成果，为叠加区域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

2.区域经济社会面貌的历史性改观积聚“后发”优势。当前，脱贫地区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叠加区域交通、用水、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承接发达区域产业转移

^①资料来源：《学习经验找差距拓宽眼界抓落实——文山州年轻干部专业化能力提升培训班赴红河州考察纪实》，http://www.wsdx.gov.cn/dx_xygl/p/6743.html。

^②资料来源：《革命老区脱贫奔小康 驶入振兴发展“快车道”》，<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0301/c1004-32039332.html>。

^③资料来源：《脱贫攻坚的“西吉样本”》，<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123/c1001-29779935.html>；《宁夏西吉：向精准扶贫最后阶段冲刺》，https://dangjian.gmw.cn/2020-06/15/content_33913388.htm。

的能力得到极大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乡村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①。同时，民族地区的农业将迎来新一轮增长。有学者预见，未来一段时间滇黔桂边区的云南、贵州等欠发达省份的农业增长将进入高速成长阶段，而中东部地区将成为萎缩型、停滞型或低增长型农业区（叶兴庆，2021）。上述基础环境与发展机遇将成为叠加区域乡村振兴的“后发”优势。

3.后扶贫时代的政策接续和社会愿景更加明确战略定位。进入后扶贫时代，党中央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有着精准的战略定位，即承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统筹推进和迈向共同富裕崭新目标的重大使命。定位越是精准、使命越是艰巨，就越能激发内外动能，越能抢抓发展机遇。《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支持革命老区立足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绿色生态资源，加快特色旅游产业发展，推出一批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和精品线路。”^②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强调：“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社会帮扶等机制，并根据形势和任务变化及时完善。”^③此种接续性的政策、包容性的机制和艰巨性的使命，使得叠加区域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拥有稳定的政策支撑、精准的谋划方略、宏伟的奋斗目标，为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创造了契机。

（三）生态治理契机：新发展理念引领与国土空间结构的绿色转型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西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发展重在生态。深厚的生态治理底蕴、动态的生态补偿机制、严格的生态追责制度，为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生态契机。

1.深厚的生态治理底蕴积存内生动力。过去相当长时期的乡村建设“求生存”，而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乡村振兴“求生态”。叠加区域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这是当地独特的绿色资本。对于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农牧民而言，清澈的河流、原始的山林草原是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对自然物的保护已成为当地习惯法，而这种习惯法的权威力源于民族内部的舆论力、道德力、宗教力，这几道力量共同合力以调整各个民族的环境行为（刘雁翎，2015）。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叠加区域乡村，一方面，农牧民尊崇万物皆有生命的教理，山川、草原、河流、湖泊、树木等都被农牧民赋予神性，祭拜神山、圣湖是当地人必不可少的信仰行为；另一方面，令行禁止乱砍滥伐的传统规约使得农牧民对自然的敬畏与信奉已内化为一种自我约束意识。例如，滇桂黔边区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侗先民很早就以碑刻形式设立“禁入神山神林，禁止乱砍滥伐树木、破坏地表植被、污染水源地、过度捕捞”的村寨规约（杨美勤和唐鸣，2019）。这种深厚的生态治理底蕴，高度契合绿色优先的新发展理念，为当前重建“高颜值、高品质”的乡村生活环境提供了内生动力。

^①例如，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农户比重从2015年的43.3%提升至2019年的86.4%（孙久文等，2021）。

^②参见《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http://www.gov.cn/xinwen/2021-02/22/content_5588236.htm。

^③参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https://www.gov.cn/xinwen/2022-03/31/content_5682705.htm。

2.动态的生态补偿机制夯实利益协调基础。近年来,国家不断优化空间结构,对主要提供生态产品的功能区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叠加区域作为主要的生态功能区,如何协调生态功能区的资源开发、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及生态修复之间的关系,需要实施更为有效的平衡策略。例如,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已治理石漠化面积3300万亩,且按要求持续做好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灾害防治、石漠化治理、水土保持等各项工作^①。随着党的十九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党和政府不断破除静态、僵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多元化补偿方式、完善补偿标准、构建差异化的补偿体系,为叠加区域农牧民算好“经济小账”与“生态大账”、协调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提供了保障。这一动态的平衡机制,在“五个一批”专项扶贫工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分类谋划乡村振兴策略夯实了利益协调基础。

3.严格的生态追责制度提供法制保障。叠加区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环境脆弱,不能重蹈其他区域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为了有力促进生态治理现代化,党中央建立健全最为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惩戒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2013年习近平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②。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空前严格的生态追责制度以及通过建立健全环境舆论监督机制,从根本上推动了叠加区域生态治理现代化。例如,近年来,广西左右江革命老区(百色市、崇左市和南宁市)石漠化治理成效、植被生态质量和改善程度均居全国首位^③,为该地区打造富有壮乡特色的美丽乡村创造了条件。

(四)文化振兴契机:红色革命文化、民族特色文化与乡愁历史文化的集成优势

乡村是集经济生产、社会治理、文化习俗为一体的地域综合体。叠加区域乡村拥有丰富多样的红色革命文化、民族特色文化和乡愁历史文化,多重文化属性的集成优势是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

1.红色文化:革命老区文旅资源亟待发掘。习近平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④叠加区域如何实现红色文化资源(详见表4)开发与党史学习热潮有效衔接,是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强调:“到2025年,革命老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巩固拓展,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①资料来源:《两部门召开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推进会》, http://www.gov.cn/xinwen/2015-08/24/content_2918944.htm。

^②资料来源:《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集体学习》, http://china.cnr.cn/news/201305/t20130525_512667412.shtml。

^③资料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http://www.gxzf.gov.cn/zfwj/zzqmqzfbgtwj_34828/2021ngzwbwj_34845/t11147440.shtml。

^④参见《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9/30/content_5640402.htm。

优先支持将革命老区县列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①当前，叠加区域正以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为契机，深度挖掘红色文化，以此助推乡村产业兴旺、涵育乡村文明风尚、促进廉政教育与乡村治理有效、加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迈步前进。例如，四川省在 2018 年就已积极探索包括阿坝州红原县邛溪镇、甘孜州泸定县磨西镇、雅安市石棉县安顺场镇在内的少数民族革命老区红色旅游特色小镇建设和红色文化传播路径^②。《四川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更是明确强调，少数民族地区要以高标准长征红色文化传承来助力乡村振兴^③。

表 4 叠加区域红色文化资源概况

革命老区	省份	境内典型红色文化资源
川陕革命老区	四川省	会理县皎平渡红军渡江遗址、会理会议遗址、冕宁县彝海结盟纪念馆、冕宁县红军长征纪念馆、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泸定县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甘孜县朱德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等
滇桂黔边区 (广西左右江革命老区)	云南省	文山市第一个党支部旧址、王有德故居、楚图南故居、麻栗坡烈士陵园、广南地下党领导武装起义指挥部旧址、柯仲平纪念馆、广南县革命烈士陵园等
	广西壮族自治区	百色起义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红七军红八军乐业会师纪念馆、果化苏维埃人民政府旧址、田东县百谷红军村、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旧址、红军岩·通天河景区、那坡县烈士陵园等
	贵州省	遵义会议遗址、木黄会师纪念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中共黔桂边委旧址、红七军黔桂边委卡法连队支部遗址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一纵队司令部旧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五一”集会旧址等
陕甘宁边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中国工农红军西征纪念馆、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旧址、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馆、关桥堡会议旧址、红二方面军干部会议贺家堡会址等

资料来源：《四川少数民族革命老区红色文化传播路径研究》，<https://cbgc.scol.com.cn/news/1873300>；《文山市：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奋斗精神》，《云南日报》2021 年 9 月 20 日 01 版；《红色旅游促振兴，老区脱贫显成效——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红色旅游发展典型案例》，https://www.ndrc.gov.cn/xwdt/ztl/qgxclydxalhjpxl1/hslyfzdxal/202106/t20210608_1282773.html；《讲好贵州红色文化故事》，https://www.guizhou.gov.cn/dcgz/rwgz/hsjy/202203/t20220317_73022101.html；《宁夏同心县红色资源亟待挖掘》，《光明日报》2016 年 10 月 26 日 09 版；《这里是带着“红色基因”的土地——宁夏海原县革命遗迹寻踪》，https://difang.gmw.cn/nx/2021-07/20/content_35008647.htm。

2. 特色文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文化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依托，叠加区域乡村振兴的优势之一在于保留有独特的村寨特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和道德规训文化。近年来，这些区域致力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一是依靠本土的特色民族文化发展旅游产业，例如川陕革命老区将彝族“红黄黑三色”文化、藏族游牧文化、羌寨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旅游产业。二是生产

^①参见《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http://www.gov.cn/xinwen/2021-02/22/content_5588236.htm。

^②资料来源：《四川少数民族革命老区红色文化传播路径研究》，<https://cbgc.scol.com.cn/news/1873300>。

^③参见《四川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https://www.sc.gov.cn/10462/c108550/2021/12/15/9fdd9b09c5ad45a193e57654e7bb609b.shtml>。

非遗文化产品，例如非遗特色手工技能的发挥实现了少数民族“金字塔底层”的包容性创新（郭咏琳和周延风，2021）。三是传承正向的自然观、价值观和伦理观，通过移风易俗、文化交流和弘扬道德规训文化来重塑社会价值。例如，滇桂黔边区的铜仁市充分利用苗族、土家族、白族、仡佬族等民族文化优势，开展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民族特色建筑、民风民俗等方面研究，通过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①。叠加区域特色文化的传承创新，是因地制宜“文化扶贫”的重要内容，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积极形式。

3. 乡愁文化：“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存量。乡愁文化是现代社会城市扩张与乡村消退的产物，“乡衰是乡愁的根源”（李华胤，2023），乡愁文化的浓厚程度往往与经济发展程度呈负相关。在经济发达地区，乡愁文化几乎被现代性洗涤殆尽；而在欠发达区域，传统底色的黏合力、经济发展的受挫感、自然风光的优越性共同缔造了浓郁的乡愁文化。习近平正是在欠发达的云南考察时指出，新农村建设要“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②。2015年6月，习近平在滇桂黔边区的遵义市花茂村视察时谈道：“怪不得大家都来，在这里找到乡愁了。”^③新时代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如何使“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乡愁文化存量转化为文化增量，“使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融入乡村建设与维护”^④，既是叠加区域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难题，也是有利契机。

五、叠加区域乡村振兴的行动路径

叠加区域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在审视均衡性治理与国家化整合、政策衔接与战略实施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区域内在特质，深刻把握政策联动、社会巨变、生态治理、文化振兴的“后发”优势，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具体行动。

（一）加快产业融合振兴，积极培育“红色产业+民族特色产业”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是高质量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的经济基础。叠加区域乡村产业兴旺，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产业振兴的功能，发掘自身的优势底色，深刻把握政策、红色、生态、文化契机，走实、走好绿色优先、红色旅游产业叠加少数民族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第一，强化基层党组织在“红色产业+民族特色产业”融合振兴中的统合引领力。“办好农村的事，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⑤叠加区域乡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站起来”的根据地，

^①资料来源：《贵州省铜仁市以民族文化助推乡村振兴》，<https://www.neac.gov.cn/seac/mztj/201912/1139350.shtml>。

^②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22页。

^③资料来源：《总书记挂念的红色老区 | 花茂村的“美丽乡愁”》，http://news.cnr.cn/native/gd/20210616/t20210616_525513371.shtml。

^④《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2页。

^⑤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http://www.lswz.gov.cn/html/xinwen/2023-02/13/content_273655.shtml。

是“富起来”的短板，更是“强起来”的后起区域。步入新时代，一方面，亟待通过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产业振兴中的党员参与（黄承伟，2022），将乡村产业带头人、西部计划志愿者、春晖人士和新乡贤等群体吸纳进党组织，“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①，鼓励“生于斯、长于斯”的产业技术人才回归乡村。利用“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产业精英带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协调各方关系、调动振兴资源、利用先进技术、振兴民族产业与红色产业。另一方面，以党组织的统合引领力，持续加强对叠加区域的产业政策优惠力度，做好革命老区振兴规划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充分实现中央统一政策与区域发展政策的“叠加效应”（张启正等，2022），发展乡村“红色产业+民族特色产业”、迈向共同富裕。

第二，基于内生的整体性历史底色，培育壮大乡村新型集体经济。叠加区域乡村长期以来因共同的生产、血缘、习俗、宗教、规约等养成了整体性的自治传统。脱贫攻坚以来，区域性绝对贫困得以消除，在此基础上，要不断挖掘整体底色，培育壮大村集体经济。既需通过完善优化“三资转换”改革、“拆旧不复垦”集体建设用地储备、政策性资金扶持项目资产移交等方式，充分盘活村内闲置的集体存量资源和资产存量，扩大资产增量，做大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规模。还需创新“运营主体+村集体+农户”合作模式，例如在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红色旅游产业发展中，探索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权益按份共有的运营机制，保障村民共享发展成果。

（二）就地盘活党史中的民族团结教育资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心聚力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②叠加区域有着丰厚的红色资源和党史元素，有着各族群众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牢固根基。当前，叠加区域乡村振兴要就地盘活红色资源，并以之为基础汲取党史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智慧，创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乡村共同体。

1.就地盘活党史中的民族团结教育资源，强化“五个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心聚力。“在中国乡村，地域广阔，类型多样，人们的文化习惯、价值观念、精神风貌存在不小差异”（秦中春，2020），在叠加区域，区域因素与民族因素的叠加使乡村建设面临复杂的认同问题。“在今天，对民族认同的诉求成为社会秩序与团结的主要合法性来源。”（史密斯，2018）中华民族是统一的大家庭，内含着基于成员共有价值、共识基础上的认同。叠加区域有着认同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团结带领下团结奋斗的光荣传统。在新时代，要利用大数据、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数字技术，就地盘活党史中的民族团结教育资源（例如在长征时期，川陕革命老区甘孜藏族自治州白利寺格达活佛协助红军过境、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③等），

^①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6页。

^②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23：《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第110页。

^③资料来源：《小叶丹：彝海结盟谱写民族团结之歌》，<http://cpc.people.com.cn/n1/2022/0729/c443712-32488716.html>。

以增强叠加区域乡村农牧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塑造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乡村共同体。

2.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促进红色资源传播，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区域、城乡差距过大，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族地区乡村的现代知识文化传播受限、农牧民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低下。高山峡谷、大江大河的阻隔导致叠加区域农牧民生活的区域流动性较弱，农牧民与城市、内地的交往较少，且识字率低，尤其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低下，更加强了他们的封闭性特征。叠加区域乡村激发内生发展动力、传承红色精神、赓续红色血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统一的语言文字媒介。对于叠加区域乡村振兴，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更是关键一环。只有加强该区域乡村的知识扫盲、双语教育，充分发挥通用语言文字在提升农牧民对党和国家认同方面的媒介效能，才能有力促进红色资源传播、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三）发挥红色文化与生态文化浸润功能，防止返贫文化惯性并防范民俗异化

贫困是会自我繁衍的，而当贫困具有正当性之后会加速自我繁衍，会冲蚀外部的反贫困力量。有效阻断叠加区域规模性返贫，衔接实施乡村振兴，需从根本的文化痼疾着手，依托红色文化、生态文化消解致贫返贫文化。

1.挖掘红色文化，防止返贫文化惯性并防范民俗异化。在当前叠加区域乡村，贫困文化价值观、精神追求先于物质生活的理念依旧对部分少数民族农牧民的思维和行为有影响。因此，当地社会各界要以正确的价值观积极引导农牧民转变致贫返贫的思想观念，坚决抵制不利于脱贫致富的文化习俗的侵蚀。与此同时，弘扬现代文化，特别要依靠党史学习和当地红色文化资源发掘，传承“积极向上、艰苦奋斗”的革命文化，祛除“躺平”“享乐”的贫困文化，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有机结合，控制现代性在消费领域的过度扩张（李小云和高明，2018）。要防止不良风气冲击传统民俗，例如川陕革命老区凉山州彝族乡村“高价彩礼”^①造成的婚俗异化，严重阻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推进。

2.协调经济发展模式与生态文化信仰的内在关系，改良文化致贫返贫的社会土壤。有效治理叠加区域文化相对贫困，就要创造性地吸收整体机制的积极成分。例如，借助共同体的道德和习俗规范、生态理念，重塑田园家园的生态观。叠加区域如若以破坏生态的代价追求经济效率，不仅会带来“资源的诅咒”，而且会冲击区域民族的文化信仰，进而使少数民族正向的生态信仰与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之间发生冲突。为此，这一区域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需坚持生态优先发展模式，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调民族地区生态认同与国家发展模式认同的关系。政府要大力支持绿色产业发展，出台倾向绿色发展的政策，加快绿色旅游的步伐，弘扬民族生态观、激发现代乡愁底蕴、积极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平衡乡村经济发展与绿色生态之间的关系。

3.巩固文化脱贫成果，实现向乡村振兴的平稳过渡。叠加区域脱贫攻坚在外部力量推动下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习惯性贫困底色，使得脱贫不久的农牧民很容易陷入返贫困境，

^①资料来源：《搬走乡村振兴“绊脚石” 四川综合治理彝区高价彩礼问题》，<https://sichuan.scol.com.cn/ggxw/202203/58471475.html>。

少数民族农牧民容易就此产生扶贫依赖。在后扶贫时代，需要综合施策，利用红色文化加强农牧民感恩教育。积极培育新乡贤，让乡村能人与新时代的反贫困基调相契合，引导反贫困的志向，宣扬正确的价值观。充分发挥民族村寨等整体性单元的积极功能，利用好绿水青山，创新特色工艺等乡愁文化载体，鼓励人们改变传统的生产思维，提高人们参与市场经济的意识，创新农村集体经营方式，以现代市场化、竞争性、个体性的财富积累文化消弭传统共同体的贫困文化。

（四）有效推进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扭转民主治理的“少一边一穷”困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①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关涉全体人民、全部区域的最真实、最广泛、最管用的民主。叠加区域是党在民族地区倡导践行民主权利的试验田。推进该区域乡村振兴，重在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充分激发农牧民主体意识、保障农牧民主体地位、实现农牧民主体权利。

1.着力构建“人民乡村”知识体系，扭转民主理念“少一边一穷”局面。叠加区域的农牧民深受传统权力的支配，该区域长期缺乏自治治理的社会土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叠加区域农牧民不断获得了作为共和国公民的民主权利。进入新时代，一方面，基层党员干部、政治工作者等乡村精英群体要运用线下和线上会议平台、凭靠数字治理技术（王亚华和李星光，2022），如互联网、微信、短视频和自媒体等，组织学习和研讨习近平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政治的重要论述，充分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精髓，借助民主的赋能展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朱碧波，2023）；另一方面，乡村精英们要充分传播“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理念，让农牧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主人地位，调动农牧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2.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链条，优化民主治理机制。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贯通“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②全链条的民主。其一，在村“两委”换届选举、乡村组织成员等的选举中，充分保障各族农牧民平等参与选举的权利。其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统一。乡村公共事务“商量着办”，要严格按照治理主体协商议事的程序规则进行，寻求农牧民意愿的“最大公约数”。其三，村庄公共决策要吸纳农牧民公意、广泛征求与收集农牧民意见。其四，依法保障农牧民监督权的行使、畅通农牧民监督的多元渠道，健全乡村小微权力监督和失职问责机制。

3.广泛、真实、有效增进农牧民福祉，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有效的民主，是囊括各地区、各民族、各群体的民主，其真谛在于全方位赋予农牧民平等权利、保障农牧民主体地位。首先，深入贯彻落实广泛性民主的制度意涵，要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和行动广泛渗入农牧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实现民主过程的持久良善运行。其次，在人民民主的制度层面，要充分彰显真实性，防止“民主无民、民主空转”，切实将农牧民公共意志贯穿于治理

^①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9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中国的民主》，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页。

实践活动。最后，需要健全“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积极引导自治、德治、法治传统中的正向因素，将其中的规范社会行为、增强道德感化等因素加以整合，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现代乡村治理。只有因地制宜地解决治理机制不健全带来的乡村衰败问题，才能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六、结语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让任何一个区域掉队。叠加区域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着全国各族人民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牢固根基。叠加区域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需要综合自然地理特征、经济发展水平、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国家政治整合和民族宗教问题等多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该区域乡村集中分布在地理位置偏远的西部省份，地缘环境封闭、交通条件落后、外部交往交流度相对低下；其次，历史上叠加区域的农牧民长期从事低水平的经济生产活动，人力资本和现代技术缺乏、经济发展更为落后，发生贫困代际传递；再次，该区域乡村即便民族成分多元、宗教信仰迥异，但有着认同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各族群众实现民主权利的试验田；最后，正是因为该区域乡村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党和政府长期给予广泛的政策支持和实质帮扶。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叠加区域乡村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契机。在未来征程中，叠加区域乡村振兴要因地制宜推动、实事求是布局。一要培育壮大“红色产业+民族特色产业”，走出产业振兴新路子；二要盘活当地丰厚的红色资源，发掘民族团结教育智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魂赋能；三要发挥红色文化和生态文化叠加浸润的功能，防止返贫文化惯性并防范民俗异化；四要因地发掘鲜活的民主治理案例，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真正保障各族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

参考文献

- 1.陈文胜、李珊珊，2022：《论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贵州社会科学》第1期，第160-168页。
- 2.次旺俊美，2008：《西藏宗教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第160-161页。
- 3.高杰，2020：《多类型重叠区域脱贫攻坚面临的困境与破解——以四川省雅安市为例》，《农村经济》第7期，第63-69页。
- 4.郭咏琳、周延风，2021：《从外部帮扶到内生驱动：少数民族 BoP 实现包容性创新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第4期，第159-180页。
- 5.贺雪峰，2020：《未来十五年乡村振兴的时空维度、社会条件及预判》，《党政研究》第5期，第42-45页。
- 6.黄承伟，2022：《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中国农村经济》第12期，第30-34页。
- 7.李成武，2005：《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载张星星（编）《当代中国成功发展的历史经验——第五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第413页。
- 8.李华胤，2023：《理解中国现代乡愁：理论与方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73页。

- 9.李小云、高明, 2018: 《现代性与亚文化: 深度性贫困少数民族群体消费与贫困的研究》,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第37-46页。
- 10.林万龙、纪晓凯, 2022: 《从摆脱绝对贫困走向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中国农村经济》第8期, 第2-15页。
- 11.刘雁翎, 2015: 《西南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的生态文明价值》, 《贵州民族研究》第5期, 第23-26页。
- 12.卢黎歌、武星星, 2020: 《后扶贫时期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学理阐释》,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2期, 第89-96页。
- 13.罗敏、陈连艳、周超, 2016: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基于共生理论的分析》, 《广西民族研究》第6期, 第63-71页。
- 14.吕进鹏、裴元圆, 2020: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复合型治权结构及行动逻辑: 历史底色与现代启示》,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第66-72页。
- 15.马天航、熊觉, 2018: 《理解“国家自主性”: 基于概念的考察》, 《学术月刊》第8期, 第80-92页。
- 16.秦中春, 2020: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目标与实现途径》, 《管理世界》第2期, 第1-6页、第16页、第213页。
- 17.史密斯, 2018: 《民族认同》, 王娟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第24页。
- 18.汪三贵、胡骏, 2020: 《从生存到发展: 新中国七十年反贫困的实践》, 《农业经济问题》第2期, 第4-14页。
- 19.王亚华、李星光, 2022: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制度分析与理论启示》, 《中国农村经济》第8期, 第132-144页。
- 20.王延中、丁赛, 2020: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成效、经验与挑战》,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1期, 第8-16页。
- 21.徐勇, 2019: 《论现代化中后期的乡村振兴》, 《社会科学研究》第2期, 第36-41页。
- 22.严庆, 2012: 《民族、民族国家及其建构》, 《广西民族研究》第2期, 第9-14页。
- 23.杨美勤、唐鸣, 2019: 《民族地区传统生态文化的现代困境与转化路径研究——基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调查分析》, 《贵州社会科学》第3期, 第94-101页。
- 24.叶兴庆, 2021: 《迈向2035年的中国乡村: 愿景、挑战与策略》, 《管理世界》第4期, 第98-112页。
- 25.于春洋, 2016: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 理论、历史与现实》,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49页。
- 26.张启正、袁菱苒、胡沛楠、龚斌磊, 2022: 《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对农业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 第38-58页。
- 27.张雪、叶忠, 2018: 《基于贫困文化理论的农村学校发展定位思考》, 《教学与管理》第1期, 第1-4页。
- 28.朱碧波, 2023: 《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第13-21页。

(作者单位: ¹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²西南财经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³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

(责任编辑: 黄 易)

Multidimensional Difficulties, Practical Opportunities, and Action Path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Intersection of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and Ethnic Areas

LV Jinpeng JIA Jin

Abstract: The intersection area of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and ethnic areas has witnessed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choos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ha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country to identify with the CPC.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intersection area is that it is not only an old revolutionary area with diverse ethnic groups, but also different from general minority-inhabited areas. The villages in the intersection area are geographically remote with low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istinctive ethnic characteristics, of which the development depends on policy support. To promote high-qual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supposed to fully consider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regional factors and ethnic factors, and further explore rich red resources and revolutionary elements. In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balanced governance, nationalization integration, policy cohesion, and strategic planning, it is urgent to deeply analyze historical entanglements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utilize the “latecomer” advantages of policy linkage, social changes,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intersection area requires: a) accelerating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and actively cultivating “red industries + nation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b) revitalizing the educational resources of national unity in the CPC history, and creating a cohesive force for the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infiltration function of red culture and ecological culture, and preventing the cultural inertia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and the alienation of folk customs; d) effectively promoting people’s whole process democrac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addressing 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the “minority-inhabited, border, and poor” areas.

Keywords: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Minorities Areas; Rural Revitalization